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丁玲评传

秦林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丁玲评传

秦林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评传 / 秦林芳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10956 - 0

I. ①丁… II. ①秦… III. ①丁玲(1904~1986)-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095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
书 名 丁玲评传
著 者 秦林芳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 - 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5 字数 42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956 - 0
定 价 87.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001 / 第一章 湘西“孤女”
- 015 / 第二章 启蒙时代
- 029 / 第三章 “自由飞翔”
- 050 / 第四章 早期创作
- 068 / 第五章 走向“革命”
- 085 / 第六章 转折期创作
- 111 / 第七章 “意外”与《意外集》
- 127 / 第八章 “到前线去”——陕北前期之一
- 149 / 第九章 在“文协山头上”——陕北前期之二
- 179 / 第十章 陕北后期
- 207 / 第十一章 在解放区
- 218 / 第十二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
- 235 / 第十三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下)
- 254 / 第十四章 “跨进新的时代来”
- 269 / 第十五章 文学新体制的营构(上)

- 290 / 第十六章 文学新体制的营构(下)
- 306 / 第十七章 历史意识与“一本书主义”
- 325 / 第十八章 “战胜教条主义”
- 338 / 第十九章 风暴骤起
- 350 / 第二十章 抗争与沉沦
- 374 / 第二十一章 “脸上刺字的流囚”
- 394 / 第二十二章 逆境中的惯性
- 408 / 第二十三章 平反之路
- 423 / 第二十四章 “韦护精神”
- 436 / 第二十五章 《“牛棚”小品》与其他
- 454 / 第二十六章 “政治”的梦魇
- 469 / 第二十七章 遥远的回声
- 484 / 第二十八章 政治化的小说写作
- 500 / 第二十九章 访美之行与《访美散记》
- 517 / 第三十章 “文人相轻”的背后
- 533 / 结语
- 536 / 后记

| 第一章 湘西“孤女” |

1904年10月12日(农历甲辰年九月初四),蒋家一名女婴在湖南省常德县外祖父余泽春家的深宅大院里呱呱坠地。她后来成长为一名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女作家,以笔名“丁玲”行世,其他使用过的笔名还有“曼伽”、“彬芷”、“丛喧”、“晓菡”、“毛毛”等。关于自己的姓名和笔名等,她后来作过如此说明:“我小时在家叫冰之,上学时取名蒋伟,是我母亲给取的。我上中学时自己改为玮。到上海进平民女子学校,用冰之名。废姓引起很多麻烦,只好随便加了一个姓。后来为去上海想当电影演员,改名丁玲,投稿时便又用了它,‘丁玲’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们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一个字作名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①她的原籍是在常德之北的安福县(1914年改临澧县)修梅乡沃沙村黑胡子冲

^① 丁玲:《致叶孝慎、姚明强》(1979年7月7日),《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下引《丁玲全集》其他各卷,版本均同此。

(现为余市桥镇高丰村建新组),在临澧县城西北约十公里。

高尔基曾经指出,对于作家来说,童年印象“具有决定意义”。^① 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几乎都把童年经验看做是生活的宝贵赐赠,看做是自己不竭的创作源泉。这里所说的“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②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它之所以对于一个作家具有“决定意义”,就在于它使作家在创作之前就形成了看取世界、看取人生的心理定势和特有视角。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就作家而言,他的童年的种种遭遇,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欢乐,他的缺失,他的创伤,他的幸运,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对他的幼小生命的折射,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这个先在意向结构核心是如此顽强,可能对他的一生都起着这样和那样的引导、制约作用。”^③ 在丁玲童年经验形成过程中,地域、时代尤其是家庭等因素发生了重要作用。

任何个体都是文化的造物。不管何人,其心灵深处都会刻上地域的、时代的文化印记。常德、安福两县,均处湘西。作为一种遗传基因和精神血液,风格独具、流布绵远的湖湘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湘西文化)在丁玲诞生之际就深植于其内心深处,并在其血管中流淌。1931年9月,沈从文为纪念胡也频作长文《记胡也频》,其中对湘西“蛮”性文化的特质以及丁玲与湘西文化的关系就作过这样的描述:丁玲“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

① [苏]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② 现代心理学一般把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就丁玲本人而言,其“儿童期”大体是指从出生到1922年出湘赴沪之前。

③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①。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该书出版前,沈从文“给丁玲看过的,征求过丁玲的意见”^②。沈从文本人在1933年所作《记丁玲续集》中也早已写道:“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指丁玲——引者)所经手的。”据此,可以认为,丁玲自己对沈从文的上述分析应该是认可的。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后来的丁玲也表现出了湘西文化所赋予她的那种泼辣、倔强、执着的“蛮”性文化特征。1949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丁玲应邀在许杰的纪念册上题字:“文学工作是要有一批‘死硬派’的,就是不管怎样有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一件严肃而艰苦的工作,须要一批老实而忘我的人去努力。”^③她倡导的这种“死硬”精神,正是“不大聪明,拙于打算”的湖湘文化(尤其是湘西文化)孕育的结果。后来,也有学者曾以“辣”、“倔”、“蛮”三字来概括丁玲的个性气质,指出:“她火辣、热情;她倔强、执着、乐观洒脱、刚毅勇悍、好胜任性;她又具有‘蛮霸’的精神,吃得苦,耐得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④

①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56页。

② 见巨文教:《张兆和、汪曾祺谈沈从文——访张兆和、汪曾祺两位先生谈话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期。

③ 许杰:《死硬精神分外香——对丁玲同志创作的片断回忆》,《河北学刊》1984年第5期。

④ 彭漱芬:《“辣”、“倔”、“蛮”——丁玲个性气质的文化基因及其丰富、发展》,《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如果说“不大聪明，拙于打算”的“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是湖湘文化（尤其是湘西文化）传统给丁玲的赐予，那么，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则给了丁玲的成长提供了大舞台。美籍学者周锡瑞指出，湖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性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十九世纪时，湖南被看做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而在二十世纪，作为毛泽东和其它近代革命党人的家乡，湖南博得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声誉。”^①独特的湖湘文化在这一历史区间里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元素，在变动不居的大时代中显示出了更大的影响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地位之重要，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开始显现出来。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扩大了湘学的影响力。而到十九世纪末，处在中国腹地的湖南更成了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行者”。这一运动在湖南持续时间不长，因而，“它对于湖湘文化的最大意义不是新政的具体实施本身，而是借由学堂、学会和报纸三利器，造就了大批维新人才，使得湖南一度成为全国开风气的省份”。此后，受维新运动之影响，湖南形成了赴日留学的热潮；新思潮和新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湖南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从中产生出的社会思潮和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丁玲出生前后，正是湖南维新风气炽盛之时。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下，丁玲父亲也曾赴日研修；在丁玲于湘地求学过程中，她所拜之师也大都是受新思潮熏染的新派人物。所有这些都对丁玲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她较早感受到时代的气息，汇入了时代的大潮。

在以整合的方式对丁玲童年体验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影响最大

^①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② 凌云岚：《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的是家庭(主要是其父亲、母亲)。1937年5月,在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亦译尼姆·威尔士)采访时,丁玲对自己的家庭出身作了这样的介绍:“我出身是中国破产的封建大家庭,蒋家是湖南省内出名的一个有势力的大族。我自己的一支都是大地主。许多祖宗,像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在朝的官吏。”^①这是一个当地非常著名的官僚地主家庭。蒋家四代为官,初兴于乾嘉两朝,盛于道光至同治年间,是一个集官、商、财于一体的大官僚地主家族。族中拥有官品头衔者多达两百人。以权力为后盾,蒋家的财富急剧膨胀,地产多达六十万亩。^②丁玲叔曾祖父蒋徵瑞(祖父的亲生父亲)是一名进士,在兵部任职。祖父蒋定礼是长子,曾在贵州为官,官至普安厅同知,三十五岁时卒于任上;生子三人,丁玲父亲蒋保黔(号浴岚)最幼。

这个封建官僚大家族人丁兴旺,地位显赫,曾经富甲一方。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时这样说道:

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彼此都

①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该书在第三部分“妇女与革命”中专辟一节“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记述了1937年5月丁玲接受其采访时四次谈话的内容。由于作者立意要将她“告诉我的故事准确地记录下来”,使之成为“简单、朴素、拘泥于事实的传记”(见第181页),所以,这些记述可视为丁玲的长篇口述自传,多可征信。它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丁玲对自己家庭和过往生活、思想道路的回忆,而且保存了丁玲许多不见于《丁玲全集》的自我感悟类、评价类文字,因而显得相当珍贵。四十四年后,丁玲在1981年访美期间还于11月21日看望过作者,回国后作散文《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其中写道:“后来她出版了《续西行漫记》,是对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补充,引起了许多人在图书馆里争相阅读。她对中国革命的友谊,是我们许多人都不会忘记的。”由此,也可见出丁玲对作者及其《续西行漫记》的肯定。

② 参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十二分亲近。家中还算有钱，我的祖父，做过很大的官。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①

近半个世纪后的 1980 年，晚年丁玲对此还作过这样的描写：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②

同是安福（临澧）人的林伯渠 1937 年 5 月在延安告诉丁玲，蒋家的建筑非常考究，连《红楼梦》里的房屋也没那么华丽。湘西的人是个个知道那个“蒋宅”的。

但是，对于童年的丁玲来说，蒋家曾经的富贵，只是一个口耳相传的“遥远的故事”，给她带来的至多也不过是阴森、恐怖和忧郁（“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忧郁地，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床铺非常大，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③），因而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意义可言。而使

^①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4 页。

^② 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 10 卷，第 256 页。

^③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5 页。

她产生痛切的生命体验的，却是父亲的死、家道的中落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自我命运的变迁。丁玲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个败家子”^①。他天分很高，且兴趣广博，多才多艺。他十几岁时的作文，其起承转合就显得周详辩证。十四五岁时，他就凭着自己的才华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之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他却好像是正式的。因自己从小体弱多病，他自习医术，以至久病成医，能够在乡间行医，并在附近镇子上开了中药铺。他甚至也曾有过较远大的精神追求。受维新思潮的影响，他在丁玲出生前曾东渡扶桑，到日本留学研习法律，后因肺病辍学归来。

在丁玲的记忆中，“父亲是非常体弱的一种人，但他有一个优点。他爱他自己的自由，也愿意给人自由”；“他对我母亲非常宽大，他们结婚了几年之后，他要她放足。凡是她的行为在他家中引起冲突的时候，他总不非难她的”。^② 他的这种爱自由的洒脱本性深深地影响了丁玲。据沈从文观察，“这人大方洒脱的风度，事实上却并不随了死者而消灭，十年后又依然可以从丁玲女士性格发现，成为她一生美丽特征之一点”；二十余年胡也频牺牲，丁玲“孤单一人住在上海打发每一个日子，支配她生活上各种行动的，据我看来还依然因为那个父亲洒脱性格的血液，在这

① 丁玲：《我母亲的生平》，《丁玲全集》第6卷，第63页。

②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41、242页。

个人身体中流动”。^①

这样一个天分高、有才华、性情洒脱却不善经营的世家子弟很快被生活重担彻底压垮了。他三岁亡父，十五岁时便兄弟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他的母亲和一个妹妹。生活的重担无情地压在了他稚嫩纤弱的肩头，他只好靠祖传的土地收租过日子。他像许多纨绔子弟一样，一味沉迷于“玩乐有趣”之中。丁玲曾这样描述父亲主持家政时的热闹情景：“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自己在后面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②关于其父“爱马”、“玩马”的故事，姚蓬子和沈从文也有过相关记述。丁玲曾向当时与之多有过从的姚蓬子讲过，她父亲出重金差人到外地买回多匹白马，邀请许多邻舍来骑。他自己不会骑，“只好背着一条光滑的长辫，站在草坪边，眼看白马的蹄子在绿草上奔驰着，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愉快”^③。沈从文在《记丁玲》中也记述过他“拦路赠马”的故事：往来过客只要多看马两眼，他就喜形

① 沈从文：《记丁玲》，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54 页。

有关版本及引用说明：一、该书为《沈从文别集》中之一卷，其中收入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编选者将 1933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8 日在《国闻周报》上连载的《记丁玲女士》文本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出版的《记丁玲》、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39 年出版的《记丁玲续集》两个单行本作了互参校订，恢复了单行本中被删改的文字。该校订稿经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校阅。因此，该版本比较完整可信。二、丁玲晚年对《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多有訾议，她在阅读这两个单行本时作了一百多条眉批、旁注，指出其中“歪曲了我和也频”之处。其中除有互证的个别材料外，本著对丁玲不认可的这些部分，一般不予引用。

②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 7 卷，第 5 页。

③ 姚蓬子：《我们的朋友丁玲》，蓬子编《丁玲选集》，天马书店 1933 年版。引自丁言昭编选《别了，莎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9～90 页。

于色,不但盛情邀请其纵马狂奔,而且以君子成人之美之心,执意将好马相送。

父亲以如此异常的“慷慨”、“洒脱”,坐吃山空。他吃光了租子,也渐渐吃光了土地:刚“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古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①。1908年,父亲年仅三十二岁,在即将吃光土地之时便因病撒手西去了。那时,丁玲还不满四岁,就成了一个孤女。这一重大的家庭变故,在丁玲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直到其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1985年,她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从小是个孤女,三岁多父亲就死了。母亲带我出来,我没有家庭的感受,我没有哥哥弟弟。”^②

在父亲去世之前,丁玲的家庭已经开始败落。而父亲的死,则成了家庭彻底败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时她只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她就有了这样的直觉:“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③于是,父亲的死和父亲的葬礼,构成了她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
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

① 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1页。

② 丁玲:《纪念柯仲平》,《丁玲全集》第6卷,第324页。

③ 丁玲:《死之歌》,《丁玲全集》第6卷,第312~313页。

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①

虽然那时她还不可能理解到这将构成其一生命运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是，那种“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悲哀可怕的“死”的气氛，却给她以极大的震撼，并刻入其幼小心灵的深处，变成其终身挥之不去的“印象”和记忆。

如果说当时丁玲这一“最早的记忆”的对象还只是那种直观的黑白相映的凄凉场景和那种具有弥散性的令人生惧的氛围的话，那么，其后由父亲之死和家庭败落所带来的生活的不幸，却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父亲之死，使原本的小康之家彻底坠入了困顿，使她“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②，奔返常德故里。童年的丁玲从此离开了蒋家，跟随母亲辗转漂流，开始了漫漫的“无家”之旅。从 1909 年开始至

① 丁玲：《死之歌》，《丁玲全集》第 6 卷，第 312 页。

② 丁玲：《我母亲的生平》，《丁玲全集》第 6 卷，第 64 页。

1918年夏考入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之前，她主要在常德生活，寄居在舅舅家里。即使她后来到湖南桃源、长沙等地求学，假期里仍回常德居住。她说自己“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①，即缘于她的这一经历。

鲁迅曾经这样感慨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②“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使丁玲“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这一经历，一方面使丁玲在较大程度上隔断了与蒋氏封建大家庭的联系，剪断了与封建母体相连的脐带，致使自己“没有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③，这为其后来接受“五四”反封建的新思想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和行为基础；而另一方面，又使之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十一二岁时，她就阅读了《红楼梦》，其中林黛玉的遭际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她——“那时每次读，我都比林黛玉哭得多。林黛玉哭一次，我也跟着哭；林黛玉不哭了，我也哭”。晚年丁玲把这解释为是对这个在强大的压迫势力下“毫无反抗的力量”的“柔弱女子”的同情，^④但其中又何尝没有与这位同样是寄人篱下（同样是寄居在舅舅家里）的人物的心灵共鸣？在她二十五岁时所作的自传体小说《过年》中，她对年幼的女主人公作了这样的心理描写：寄居在舅舅家里的小菡“只觉得舅舅仍然很尊严，很大，高不可及，只呼吸都表示出与凡人不一样的权威。舅妈呢，也仍然是好看，笑脸，能干，和气，却又永藏不住那使小菡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菡不懂得这些，

① 丁玲：《我的自传》，《丁玲全集》第10卷，第251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下引《鲁迅全集》其他各卷，版本均同此。

③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7卷，第4页。

④ 丁玲：《死之歌》，《丁玲全集》第6卷，第314页。

但她生来,因了环境,早使她变得不像其余小孩了。神经非常纤细,别人以为她不够懂事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她从小就被舅妈客气的款待着,但她总觉得她难得亲近”。不难看出,作者通过对小主人公内心感受的如此呈现、剖析,所表现出来的是积郁在自己心头多年的“小时生活太受压迫(我舅舅的家给的)”^①的真实体验。后来,丁玲曾对这段生活作出了这样的总结,指出:“寂寞的童年,帮助我深刻领会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②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丁玲随母亲从蒋家走出。直到1922年只身随王剑虹奔赴上海,在这十余年间,丁玲一直处在母亲的直接影响之下。为了养成她的坚毅品格,母亲从小就将她当作男儿来培养,朝着“要我能够自立”这个目标来管教。^③在延安时,丁玲曾向李又然讲述过她的这段经历:“她小时候,她母亲不教她做针线等女孩儿的活,把她当男孩子教养。”^④如果说洒脱而又短命的父亲留给丁玲的印象主要是“玩乐”、“困顿”和“死亡”,带给她的命运主要是“无家”、“穷困”和“漂泊”的话,那么,“坚毅不屈,有些男性魄力”的母亲则给了她巨大的正面影响。母亲不但塑造了她男性般坚强的意志品质,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竭尽所能为她创造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丁玲“从她身上可以发现父亲的尊严,也可以发现母亲的慈爱”^⑤。因此,对于母亲,丁玲始终怀有感戴、敬爱之心。1932年,她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小说深情描述了“母亲”曼贞(与丁玲母亲同名)寻求自立、追求真理的坎坷历程,热

① 丁玲:《致胡延妮》(1978年中秋节),《丁玲全集》第11卷,第248页。

② 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28~229页。

③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44页。

④ 李又然:《丁玲——回忆录之二》,《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⑤ 沈从文:《记丁玲》,第53页。